

访谈录

← (上接7版)

生的著作都会注意到,他说唐代中后期河朔地区的胡化是个严重问题;那么为什么到宋代“胡化”就没有了呢?河北、山西是五代、宋初政治活动的重要“基地”,胡化现象怎么淡出甚至被消解了呢?从长时段来看,这显然是个问题。但很多年里没有人讨论这些,好像唐代的问题在唐代就解决了,宋代的问题都是另外发生的。实际上这些问题都很重要。

另外,我们的研究都有特定时段,需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单元。我们研究宋代,不是从公元960年开始,任何问题都有它的前因,可能也有其后来的影响,所以你不管研究什么,都要找到合适的时间单元。比方有些问题,从晚唐、五代到宋初,尽管跨越三朝,但可能从属于一个时间单元,当时碰到的挑战差不多,解决应对的思路也是渐进的。类似地,如果研究思想史,可能有另外的时间单元;研究家族史,又有不同的时间单元。所以时间单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刚才说到“牵动”,什么是牵动?要靠问题去刺激问题、引领研究,这就是“牵动”。有一些问题,起初是别人提出的,有的他认为已经解决,有的还搁置在那里。其中有些值得跟进思考。包伟民老师刚才说,大面上的问题我们确实都有所覆盖,但是有些问题到现在还没有人去动。之所以注意到这些问题,是由现在的一些研究议题带动、“激活”的。

我举一个例子,我关注宋代的尚书内省其实是受罗祜楠启发。罗祜楠当年跟葛兆光老师写硕士论文,我读他的硕士论文时,注意到他讨论元丰期间官僚机制的层级化,官僚机构分别处理不同的事务。论文中有一段说,来自各方面的报告、请示、章奏都送到禁中,然后皇帝将这些事务分类后送到不同的部门处理。当时我问他,你以为皇帝是个收发室?皇帝若是负责分拣材料,每天就不用做别的事了。这一问题当时确实不好回答。可是这个问号一直压在我的心里:当时这些材料进入禁中后,谁来做分类、编目、筛查、分发这类事务?追踪下去,后来就有了写尚书内省这篇文章。

所以有些问题,需要有敏感,然后去跟踪。有时候我们自己写文章,觉得哪个地方可能有疏漏,一时处理不了,可以加一个注释,容日后再讨论;也有时候,我们没加这个

注释,把一片空白暂时存下来了。但是这些压着的东西,你心里得要明白,要知道这就是将来追踪的一个线头。线索是靠线头拉出来的,一些原有的东西会激发新的问题意识。

另外,我会跟学生说,本科论文我觉得选题范围可以宽泛些,本科时期属于思想方式和学术议题可以相对自由驰骋的阶段,不妨多接触各类内容。但是进入硕士研究生阶段,应该找相对比较实在的题目,例如制度史、社会史、经济史之类,这样比较容易夯实历史学的基本训练;换句话说,不宜把选题重点放在“书写”上。历史“书写”确实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是你要分辨什么东西是“书写”的结果,剥开书写对于史实的层累式包裹,需要有实在的基础功力。所以最好首先走稳“实”的这一步,在此基础上,对话语之类“虚”的东西才能把握得当。

不同时代的不同学术圈,确实有不同的研究兴趣。对这些兴趣的感悟,需要有所平衡。一方面,我们不能不顾及学术圈当下的学术兴趣;另一方面,我觉得某些兴趣是靠前沿的研究引领出来的。比如文书的研究,十年以前没法说谁对它有什么兴趣,但是这些年就很不一样了。当然这与徐谓礼文书的发现有关系,但在这之前,也已经有了—定的基础。现在社科院历史所黄正建老师还就此申请了国家重大研究课题。所以我觉得真正扎实而有意义的研究成果,应该会有引领的力量。

还有一点是,我们现在写论文,大多关心有些现象背后为什么是这样,关心 why,这当然是很重要的。但不仅如此,我们还应该非常关心 how,关心路径的问题,关心制度、设想如何实现,如何扭曲。比如我做宋代官员的考核,除了研究书面规定之外,还要问朝廷如何知道地方官员有什么表现,根据什么原则来决定是惩罚还是表彰?实践往往与宣称不同,从初衷到结果,其中有很长一段路,有非常大的演变空隙。将来如果要讨论2016年的交通状况,我们肯定不能按政府公布的交通规则来研究;但这也不等于说这个规则没有用,如果没有交通规则,那么交通状况肯定更加混乱。究竟起到作用的有哪些因素,如何相互作用,怎样一步步走过来的?桥梁、路径的问题非常值得关注,这也是选题时值得注意的方面。



邓小南:“郝若贝在课堂上,会读诺思讲制度经济学的东西,会和研究法国中世纪的教授联合开课。他给我的提醒是,要注意社会科学对人文、历史学科的刺激。……我特别认同伊佩霞教授说的,我们读社会科学是为了找一种研究方式,找一条思考的道路;而不是为了追求新鲜的词语与结论。”

美国汉学家郝若贝(1932—1996)搜集并建立中国中古史料研究资料库,成为后来“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的基础,他将资料库赠与哈佛燕京学社,目前由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负责建设。



社会科学和历史研究之间的关系

赵冬梅:下面我想问的是社会科学理论和历史研究之间的关系。其实四位老师都在不同程度上做跨学科研究。包伟民老师的城市史、财政史研究,伊佩霞老师的家族和女性研究,邓老师也做过女性研究,以及信息渠道研究,其实这些研究本质上都受到社会科学的深刻影响。包弼德老师除了是一个杰出的历史学家,还是哈佛地理分析中心(CGA)的主任、中国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的领导者。

我们做研究时需要社会科学理论。而社会科学理论,目前为止大部分来自西方经验,是对西方经验的总结。哈佛大学裴宜理教授曾经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置身于如此广阔宏大、前所未有的变革中,到目前为止却尚无突出的创造力。中国过去和现在的经历与西方确实不同,我们在研究中国历史时应该如何摆正社会科学理论和历史研究之间的关系?

包弼德:思想史可以说是距离社会科学理论最远的。他们三位可以说是社会科学的历史学者,我不是。最近两三年,有中国研究生说社会科学理论的思考方式和议题都是西方的产物,同中国没有什么关系,我觉得这个观点不太能接受。比如,经济学也算社会科学,我们不能说它只是西洋的,跟中国

社会没有什么关系——司马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讲经济了。

19世纪时出现社会理论(social theory),也只是在西欧,法国、英国、德国这三个地方。为什么是那里出现社会理论,这本身也是个历史问题。那么,社会科学理论的一些基本假设,是不是一定限定于西欧自身历史、因此对我们思考中国历史就没有启发了呢?我想不一定是。如果因为今天的主流社会科学理论具有欧洲思想史的背景,并因此来断定说社会科学理论就只对研究西方有效,我觉得这个观点是值得怀疑的。

伊佩霞:就我个人而言,社会科学是我选择研究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在芝加哥大学的第一年上了许多必修课。在社会科学课上我们读马克思和韦伯。我觉得他们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但主要基于西方的经验。如果要得到证明,应该有人去研究其他地区的历史,中国是最大的值得研究的案例,但是当时并没有什么人研究中国。我就一直想着这件事。

我想研究贵族,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家族、性别、国家建设、军队、战争,这些在世界上都是普遍的议题。我还怀有艺术史研究的信念,但我不指望做欧洲艺术史的人对中国艺术史有什么关注。不过我确实认为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进步。我参加一些会议的时候,我成了代表中国的人,带入更多外部的视角。今天做历史社会学的人确实觉得纳入其他地区的证据会更好。比如,有一种观

点认为,帝国需要更多的官僚制度,比如印度和大英帝国。但是我研究宋史发现,辽比宋更帝国化,但是宋比辽更官僚制度化。所以有时候你得承认,这个理论只在一定范围内有效,有些情况下就不起作用了。

我认为像国家、战争、家族这些话题在世界范围内有足够的共性,所以你可以加入中国的证据,并引起人们重视。杰克·古迪(Jack Goody)就很重视中国,并努力了解中国。他是人类学家,专注于前现代世界。阅读他关于财产、识字率等许多不同话题的作品,你可以看到他是如何运用中国的证据的。我觉得从更广阔的视角去观察事物与我们研究中国之间有积极的关系。我个人不会致力于新的理论的研究,但是我希望我的读者能从我这里获得一些关于中国的有趣材料,他们也可以运用这些材料,思考那些宏大议题。

包伟民:现在已经没有人会质疑,历史学科需要掌握一定的社会科学的知识。我自己的学习过程大约是这样的:要弄准很多概念。我的博士论文涉及财政领域,我不能完全用宋人财政领域的概念,而要去看看现代人财政领域相关的书籍,去读这个学科的本科教科书,把相关概念弄熟。与其他领域学者的接触对我们的思考会有帮助。

邓小南:我特别认同伊佩霞教授说的,我们读社会科学是为了找一种研究方式,找一条思考的道路;而不是为了追求新鲜的词语与结论。像古迪的社会人类学,也许我并不做那样的议题,但是那些研究对我们做社会史、制度史会有启发。把握社会科学的“真谛”并不容易,我感觉,从一些经典、从研究范例入手去读社会科学的东西,可能相对比较有效。另外,某种程度上要在“对话”的过程中去读。有些东西我们一开始会觉得非常生涩,但在一个对话的环境里,会有逐步深入阅读境界的机会。

(胡梦霞 整理;孟繁之 校读)